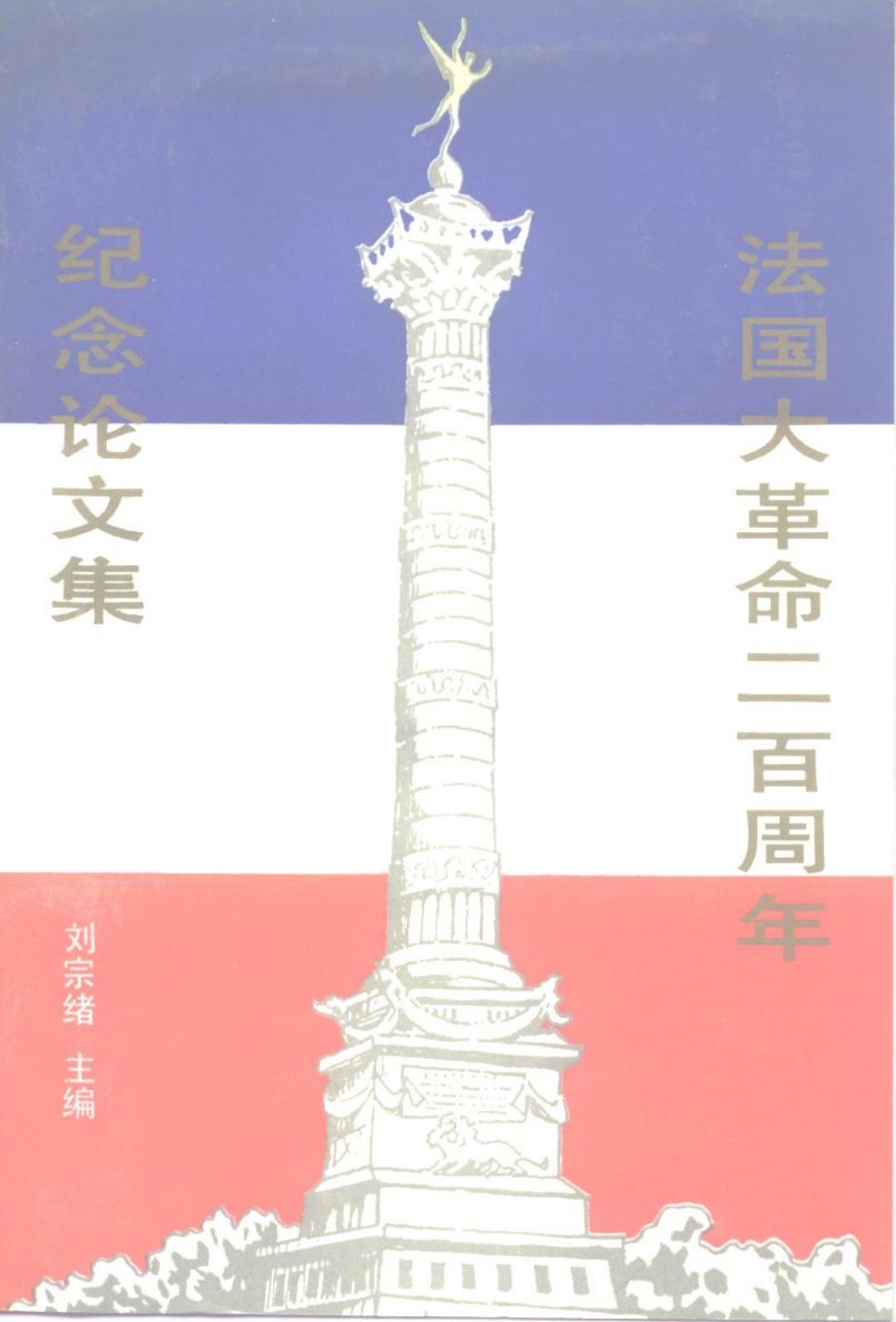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纪念论文集

刘宗绪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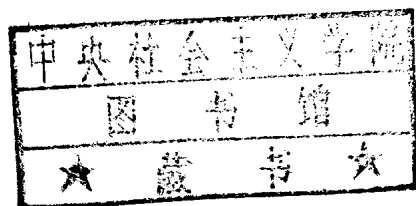


KJ65.41 / 16

78075



200223560



法国大革命 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刘宗绪主编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丘 陵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FAGUO DAGEMING ERBAI ZHOUNIAN
JINIAN LUNWENJI

刘 宗 绪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314,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定价 7.50 元

ISBN7—108—00352—X/K·42

编 者 的 话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在本论文集的序言中阐述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准备过程，并对会议内容和与会外国学者作了简要介绍。讨论会于1989年3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举行。中外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近百篇。这本文集就是编者受法国史研究会委托从提交论文中选编而成的。

所收论文大致可分三类：

- 一、法国大革命与中国；
- 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
- 三、法国大革命史中的各类专题。

论文集中篇目的排列即按照这个顺序，中外学者的文章混合编排。附录中作者简介的名次排列也依此例。

文集各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均为有关作者的观点，法国史研究会和出版单位并未就此提出看法。论文集是从介绍各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角度编辑的。

在所收文章中，除少数曾在报刊发表过外，其余都是第一次发表。

由于篇幅有限，部分未收入的文章可从文集附录的讨论会综述中窥见其主要论点，并参阅《法国史通讯》第10期。

1989年4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序言·····	张芝联 (1)
十八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法国大革命	
当时在中国未能激起回响?·····	陈祖武 (5)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	戴 逸 (12)
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	金重远 (29)
梁启超的法国大革命观·····	许明龙 (40)
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	
影响·····	玛丽安·巴斯蒂 (55)
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	章开沅 (64)
中国近代思想家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形象·····	沈 坚 (81)
憧憬与迷执：法国革命及文化对清	
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启示(提要)·····	鲍绍霖 (95)
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自由、平等、博	
爱”观·····	陈崇武 (9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冯 棠 (110)
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	张芝联 (118)
二百周年前夕的法国大革命史学·····	米歇尔·佛维尔 (127)
英语国家修正派史学和法国大革命·····	柯林·卢卡斯 (142)

从社会主义观点解释法国大革命……	玛德兰·勒贝里乌	(158)
二十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		
的介绍和影响……	俞旦初	(173)
日本的法国革命研究：一种解释……	柴田三千雄	(187)
丹东研究在中国……	楼均信	(196)
从“反革命”到“抵抗”……	莫里斯·哈特	(208)
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雅各宾派与		
布尔什维克……	申晨星	(218)
两个革命——法国革命与十月革命(提要)…	叶·科若金	(229)
法国大革命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		
不同道路……	库尔特·霍尔茨阿普费尔	(232)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形成		
的若干问题……	徐海亮	(243)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与1789		
年原则……	王养冲	(257)
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	刘宗绪	(269)
人的主要权利是提供维护生存和自		
由的权利……	弗洛朗斯·戈蒂耶	(28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大众参与……	尤天然	(297)
1789—1791年的法国国民议会……	蒂莫西·塔克特	(314)
法国革命与法属西印度有色种族，		
1789—1792……	罗伯特·福斯特	(322)
略论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与方法……	高毅	(333)
法国中学的革命史教学……	阿莱特·布莉阿	(348)

附录一：作者简介.....	(357)
附录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议程.....	(363)
附录三：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综述.....	段启增 (368)
注释.....	(384)

序 言

张芝联

1982年春，米歇尔·佛维尔教授(当时他任教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大学)受法国科研技术部委托，就如何组织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这一专题，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写出报告。他从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阿尔贝·索布尔那里得知我正在法国访问，亲自来到塞纳河畔玛丽桥附近的法语学者旅舍(我曾多次寄居这所简朴的宿舍，在那里结识了不少研究法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我们一见如故，立即转入正题。佛维尔热切地希望中国学者参加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学术活动，特别要求中国学者对法国革命的形象在中国的反响这个问题作出贡献，这是其他国家学者力所不逮的题目。我答应把他的建议带回国去，同法国史研究会和各研究所、高等院校的同行磋商。

同年8月，我在法国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介绍了法德等国筹备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情况。1983年4月，在研究会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成立了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筹备组，该组于同年5月制定了计划草案，包括编译出版有关大革命的著作和资料，召开专题讨论会，举办展览会等。1984年9月，佛维尔(这时他已继承索布尔任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应邀到北京、上海讲学，他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筹备情况表示十分满意，愿大力支持。

六年来，法国史研究会在广大会员协助下，为实现这项庞大计划而努力。除了个别项目外，绝大多数计划内的编译著作已经完

成，并已经出版，计有：

《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王养冲编，198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拿破仑评传》，李元明著，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王养冲、陈崇武选编，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忿激派运动》，扎赫尔著，申晨星译，1986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著名政治活动家》，刘宗绪等著，1988年商务印书馆。

《罗伯斯比尔选集》，王养冲、陈崇武选编，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革命引论》，巴纳夫著，王令愉译，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史词典》，端木正主编，1989年中山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探新》，刘宗绪主编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第三等级？》，西哀耶斯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

《平等派密谋》，邦纳罗蒂著，陈叔平、端木美译，商务印书馆。

《法国革命》，勒费弗尔著，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一卷，饶勒斯著，陈祚敏译，商务印书馆。

《法国革命》，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伯斯比尔评传》陈崇武著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的即将问刂或正在编译中，计有：

《1789—1815年法国史》，王养冲、陈崇武主编。

《法国革命史学研究》，张芝联著。

《法国革命史资料选译》，端木正选译。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冯棠译。

此外，在迎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日子里，《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近代史研究》、《法国研究》（武汉大学）、《史学集刊》（吉林大学）、《群言》杂志等均刊印专辑或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分别在1989年3月中、下旬举行中法学术讨论会。我会会员积极参加了这些学术活动。

法国史研究会按原计划在巴黎公社一百一十八周年纪念日——3月1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隆重举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复旦大学顾问、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谢希德教授致欢迎词，法国驻华大使夏尔·马乐阁下致贺词。全体大会在听取关于“法国大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和“大革命二百周年前夕的法国革命史学”两个报告后，分两组进行论文宣读和讨论：第一组以“中国与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第二组以“法国革命史学”为主题，其他专题研究论文均归入第二组。最后半天是大会总结，两组分别介绍讨论情况与问题，与会者即席发言。会议在缅怀已故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历史家阿·索布尔气氛中闭幕。读者在本书附录中将看到讨论会议程、论文撰稿人简介，以及这次大会讨论情况的报导，这里恕不赘述。

来自瑞士、法国、英国、美国、苏联、日本、香港的十几位学者与七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学者欢聚一堂，切磋琢磨，气氛十分融洽，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许多外国朋友表示这次讨论会是他们所参加过的同类讨论会中最成功、最愉快的一次，使他们终生难忘。在他们中间有不止一次来华访问的，如法国的M·巴斯蒂、Y·舍维里耶、M·佛维尔、M·勒贝里乌、A·布莉阿，有的已来过七八次，如M·巴斯蒂。大多数是首次光临，如法国F·戈蒂耶、J.-C·波内、日本柴田三千雄夫妇、美国R·福斯特夫妇、T·塔克特夫妇、英国M·哈特、苏联E·科若金、香港鲍绍霖。我们对法

国 M·阿居隆、苏联 A·B·阿多、民主德国 K·霍尔查普 费尔、
联邦德国 M·埃尔勃、英国 C·卢卡斯等因事因病未能到会表示 遗
憾。

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瑞士的仇大雄先生和夫人陶丽丝，这是
他们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仇大雄的出生地，他对故国故土感情深
厚，不仅从物质上而且更可贵的是从精神上赞助我们的国际学 术
交流活动。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次会议是难以如期召开的。

对于所有赞助、支持我们的纪念活动和出版事业的中外机构
和个人以及会议组织者复旦大学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表示诚挚
的谢忱。

1989年4月27日

飞往华盛顿途中

十八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当时在中国未能激起回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祖武

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整个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然而它在当时的中国却迟迟未能激起回响。直至一个世纪之后，方才成为我国有识之士的论题。探讨酿成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源，不仅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历史的个性，而且对于深入认识法国大革命也是不无益处的。

一

法国大革命沿上升路线行进的五年，正当中国清朝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同法国迥然而异。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三等级已经日趋壮大，足以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相抗衡，与封建统治的较量迫在眉睫。然而在东方，左右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仍旧是以封建宗法制纽带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迄于乾隆末叶，乃至其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席位。法国大革命的前后，中国也存在过激烈的阶级对抗，不过，这一对抗的双方并非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而是农民大众同地主阶级。诸如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湘黔边区的苗民起义，绵延于川、楚、陕一带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及京畿、豫东的天理教起义等等，皆无一例外。严酷的史实表明，在死亡线上挣

扎的农民大众，一旦争得生存下去的可能之后，他们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微薄收益，立即被顽固的封建制度无情吞噬。结果便沿着他们父祖昔日的蹒跚足迹，依旧回到以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去，成为替封建王朝创造财富的基本力量。

近数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证明，尽管自明代中叶以后，我国少数地区的某些手工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构成部分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就必然地决定了这种萌芽不可能畸型发展^①。尤其不应当忽视的是，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这样的萌芽如同一叶扁舟，随时存在倾覆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中国历史同法国历史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反差。当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敲响法国波旁王朝丧钟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正穷兵黩武，继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又接连用兵越南、尼泊尔，迫使两国统治者称臣纳贡，以所谓“十全武功”炫耀中外。同此时法王路易十六的惴惴不安截然相反，乾隆皇帝则是以“欣开入秩，幸得小康”^②而喜不自胜，大庆八十寿辰。当《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在巴黎庄严颁布，法国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旗帜昭示于世之时，人的尊严却在中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肆意践踏。乾隆帝当政的前五十年间，一反他的祖父康熙帝宽舒平和的治国风格，将其父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引向极端，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文字冤狱。晚年专擅独裁有增无已。大学士和珅招权纳贿，怙宠乱政，把政局弄得十分黑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只因就以罚款形式惩治督抚一事提出异议，疏请“永停此例”，便横遭逮捕。后虽获从宽处理，但仍然落得个“逞意妄言”^③的罪名而被降职。在封建帝王的专制淫威之下，奴性充斥朝野。据乾隆末叶来华的朝鲜使臣记载，按照清廷礼仪，每年春秋二季，官员须更换礼帽，或戴暖帽，或著凉

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下旬，乾隆皇帝自热河行宫回京，天气骤凉，因年老恶寒，便提前改戴暖帽，满朝文武见状，竞相换帽。九月末，气温回升，他一时兴起，竟换上了凉帽，于是诸臣又纷纷改戴凉帽^④。此事虽小，但于细微处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十足奴性。更有甚者，对于此时来访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乾隆皇帝坚持要特使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1793年，法王路易十六夫妇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业已八十四岁高龄的乾隆皇帝，虽然也在安排后事，但毫无被人赶下台之虞。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穷奢极侈，以太上皇自居，举行让位给其子嘉庆帝的禅受盛典。

显然，这样的客观历史环境，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是无从接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

二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不能在乾隆之际的中国社会产生反响，也是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状况分不开的。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既有经济上、政治上的深刻根源，也有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十八世纪初，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孕育了众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等，他们不仅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史上的巨擘，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光彩照人的骄子。卢梭所倡导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历史责任；他们大声疾呼要求自由、平等，给了资产阶级以空前的凝聚力。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确立了资产阶级国家基本法制的准则。尽管法国大革命前夕，卢梭等人都已相继去世，但是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却使法国资产阶级找到了批判旧制度的强大武器。而这样

的思想基础，在十八世纪末叶的中国却丝毫不具备。

同法国一样，清代前期的思想发展，也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灿烂一页。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曾经使中国知识界产生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宛若群星璀璨的时代巨人。他们立足现实，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积弊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就改良封建政治的主要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各自的主张。他们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⑤，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⑥，甚至倡言：“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⑦。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提出迎接近代历史的客观课题。因此，清初思想家所进行的“经世致用”呐喊，就其本质而言，也不是在作迎接新时代的呼唤，只是对于明朝灭亡的沉痛历史反思而已。尽管洋溢于其间的民主思想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逾越封建思想的藩篱。由于历史起点和时代环境的根本差异，清初的“经世”思想是不能同法国启蒙思想相比拟的。

十分可悲的是，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家所进行的“经世致用”努力，并未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赞许。科举取士的笼络，文字冤狱的高压，使一度蓬勃兴起的经世思潮最终为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所淹没。十八世纪初，清政府以提高南宋学者朱熹在孔庙从祀地位的形式，确立了朱熹思想对全国知识界的统治。从此，为宋明理学家所反复论证的封建伦理道德教条，成为桎梏一代知识界的沉重精神枷锁。乾隆一朝，在封建文化专制的严重束缚之下，知识界远离现实，人人自危，不得不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虽然其间也产生出戴震、焦循、洪亮吉、章学诚等杰出的思想家、学者，但是曲高和寡，孤掌难鸣，整个思想界万马齐喑，沉闷已极。

十八世纪末叶的中国思想界，由于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其理论思维水平已经落在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后面，即使是以批

判理学“以理杀人”^⑧而独步一时的戴震，也无法摆脱孔孟思想的格局。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期待十八世纪末叶的中国思想界同法国启蒙思想产生共鸣，从而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应，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三

法国大革命的不能及时作用于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清政府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⑨。这样的大一统帝国观念，自中国上古时代的西周起，世代相沿，承袭不改。入清以后，世界局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进军，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冲破昔日的封建网罗而逐步确立。然而清朝政府却顽固地坚持早成历史陈迹的帝国观念，作茧自缚，把自己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乾隆一朝，乾隆帝凭借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国力，始终以“统驭万国”的“天下共主”自居。无论是周边邻国，还是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欧洲诸国，皆被统称为“外夷”；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也被曲解为宗主国与藩属间的统属关系。对来华外国使节，则强加以“贡使”之名，夸饰为“诚心向化”；甚至邻国元首偶尔来访，也称之为“入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乾隆帝曾经做过如下自白：“天朝抚驭外夷，逆则加以征讨，顺则永受宠荣”^⑩。正是为这样的盲目自大的无知心理驱使，清政府不仅拒绝外国派遣常驻使节的要求，而且也把正常的国际贸易视为对“外夷”的恩赐，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⑪。

外交与商务混淆，商务与朝贡等同，这便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交观^⑫。由于对外交事务的无知和漠视，因此迄于乾

隆一朝，清政府在处理对外交往时，俄罗斯问题置于理藩院，其他诸国事务均交礼部，并无专门的外事机构。这样的外交观和外事体制，集中反映了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基本特征。它严重地妨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人为地拖延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也正因此而被清政府严密封锁。

关于法国大革命消息的传入中国，在以往的法国史研究中，一般认为是乾隆末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最先带来的^③。事实上，这个揣测恐怕还可以商榷。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乔治·马戛尔尼访华，一行数百人于1792年9月成行。之前，英属东印度公司总督弗兰西斯·培林曾就此先期致函清朝两广总督。同年11月，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接信，及时向乾隆帝作了报告。历时半年余，1793年6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澳门海面。经与广东地方当局交涉，然后沿海路北上，于7月下旬进抵山东登州海面。再由大沽顺水路进入天津，溯运河北行，于8月中旬到达北京。稍事休息，再于9月14日抵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17日，马戛尔尼及其主要随员又应邀参加庆贺乾隆帝寿辰的隆重仪式。21日离开热河返京。10月7日离京。取道杭州、广州回国。这就是马戛尔尼一行访华的大致行程。

据使节团秘书兼特使缺席时的全权代理乔治·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中国方面已经获悉，因此在此次访华的全过程中，并未以此为一项访问内容向中国官员通报。该书于第九章《经过万山群岛，接近澳门，开往舟山》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④。第十二章《使节在通州上陆》，又就此作了重申：“还有一点，对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